

文 / 汤重南

二战后期，盟国举行了两次重要会议，并共同发表宣言和公告，既奠定了战后的国际秩序，也为战胜日本后如何通过彻底改造，消除其对世界尤其是亚太地区和平的威胁定了调。一次是1943年11月美、英、中三国首脑参加的开罗会议，一次是1945年7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出席的波茨坦会议。

《开罗宣言》的核心是坚持对日作战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必须归还一战以来在太平洋区域所占领的一切岛屿，以及中日甲午战争以来用武力占据的所有中国领土，包括台湾、澎湖和东北。《波茨坦公告》则为战后日本的非军事化改造，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两份关键性国际文件的落实和执行，对战后的中日关系及日本社会的变化转型，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很多方面一直延续至今。

今天，我们重点讲一讲战后美国对日本的民主化改革，探讨一下其得失与利弊。

战后改革第一波

日本战败投降后，美国未与盟国充分协商，便任命麦克阿瑟将军为驻日盟军最高司令，率46万美军进入日本，迅速实现了对日本本土的单独占领和全面控制。

这一阶段，美国的对日政策非常清楚也非常严密，涉及到全部解散日本原有的军事机构、解聘日本军队相关人员、审判战犯、更换教科书等等。麦克阿瑟将军就是用传达指示、方针的方式，让日本方面必须遵照执行。

美国之所以要独占日本，一个重要考虑是担心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力量介入。而战后日本的一切行动都要听美国的指令，也为接下来它按自己的意愿对日本社会进行全面改造，做好了准备。

起初，美国的主要目的，是希望通过改造彻底消除日本再度威胁美国的可能性，这些改造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制度性的改革。美国对天

“冷战”转向 改革变味

战后初期，美国改造日本的基本政策，是以非军事化和民主化为基轴的进步政策。但随着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这些政策未能彻底执行，不少是半途而废，遗留了不少严重的问题，一直影响到今天的现实。

这种转变的根本原因，是“冷战”的兴起。随着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的实力迅速增强，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力量不断壮大发展。在中国，亲美的国民党一败涂地，共产党即将掌握政权。美国迫切地感到，千万不能再让日本也倒向共产主义。美国要转而扶植日本，成为自己的小伙伴。

所以，从1947年开始，特别是1948年，美国对日本的政策有了比较大的转变。此前彻底消除一切军国主义残余的行动，速度开始放慢，最高目的从“改革”转移到了“经济复兴”。美国开始镇压、清查日本共产党。1950年金日成发动的朝鲜统一战争，更刺激了美国对日政策的进一步转变。美国意识到，要依靠日本防共，不是为敌，而是为伍，甚至是终身伙伴，成为美国在东亚及整个亚太地区的“防波堤”。于是，以“美日媾和”为主题的旧金山会议，

中美日多重角力

客观地说，战后由美国主导的日本民主化改革，特别是众所周知的《和平宪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基本上把一个曾经由军国主义势力主导的日本帝国，改造成一个民主化的日本。

从另一个角度看，美国对日本的战后改造，又很大程度上限定了日本对美国的长期附属地位，由此带来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

比如1972年出任日本首相，积极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田中角荣，因为在中东政策等一些敏感国际问题上与美国步调不一致，最终因卷入美国企业的经济案件而被迫下台。又比如2009年民主党党首鸠山由纪夫选执政后，大力提倡“东亚共同体”，把美国排除在外，结果上台不到一年



名家讲坛

再造东瀛

——战后美国对日本改革的得与失

1957年2月，新当选日本首相的岸信介抱着年幼的外孙安倍晋三（前排右）兄弟。曾列为甲级战犯的岸信介重返政坛，并一度执政，折射出战后美国在日本实行的民主化改革，相当摇摆和不彻底。

皇制做了很多改造，废除了原来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修改和制定了新的《日本国宪法》，即通称的《和平宪法》。特别是1946年促使天皇发表《人间宣言》，宣布自己是人，不是神，天皇从掌握军政大权的国家元首，变成日本国家和国民整体的象征。虽然保留天皇的名义，但是成为“虚”位“虚”立的君主立宪制，从体制上确立了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这是非常重大的变革，不亚于一场革命，可以说对日本的民主化改造最充分地体现在这一点上。

同时，解除日本的武装，实行非军事化，要求日本不得拥有陆海空军、秘密警察或民航事业，现有的都必须解散；对日本的高级军官、极端民族主义及军国主义组织的首领都实行拘押，听候处理。这也符合当时日本国家和人民的需求。战时的日本是以军立国，一切服从军事上的需求，美国要把日本顽固的军国主义传统连根拔起。

其次，在政治方面，放开对新成

提上了日程。

1951年9月4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了52个国家参加的对日媾和会议，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没有受到邀请，印度和缅甸没有参加，苏联、捷克、波兰没有出席签字，签约国一共为49个。旧金山会议结束5个小时后，美日签署了《日本安保条约》，规定美国放弃战争赔款的请求权，继续托管琉球群岛，美军留驻日本，拥有合法的军事基地。日本也被纳入到美国的核保护伞下。

“旧金山体制”的形成，美日安保条约的签订，是冷战的产物，也是美国对日政策转变的集中表现和必然结果。自此，日本基本上回归了国际社会，取得了半独立的国际地位，在军费大幅减少的同时，利用美国的技术，以及美国及西方各国广大的市场，国内经济快速恢复，后来更成为第二大世界经济体。而美国此前对日本的非军事化、民主化等各种改造悄然停止，对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势力的整肃，不了了之。

结合日后的发展趋势来看，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改变了对日本战后的改革政策，至少留下三大“后遗症”。

第一，减少了日本的战争赔款。

就黯然离任。而政策上坚决地站在美国一方，成为忠实伙伴的日本领导人，往往能“长治久安”，现在的安倍晋三就是典型例子。

但在很多日本民众心里，其实对美国的一再强压很不满，相当一部分日本人希望摆脱美国的控制。这种心态，是一把双刃剑。尽管美国官方表示“失望”，但安倍晋三还是在首相任内去参拜靖国神社，说明即使是他这样的铁杆美国盟友，也不是十分心甘情愿完全听命于美国，不过现在羽翼未丰而已。一旦羽翼丰满，说不定会有一搏。而美国内心对日本也有所防范，它更多是借日本之力来贯彻自己的“东亚再平衡”战略。

从社会文化上说，日本现在已经

立政党和政治组织的管制，战时遭到禁止的一些政党如日本共产党，得以恢复公开活动。允许工人运动，保护工人、农民的权益，成立农会和工会，确保集会结社、创办报纸及其他新闻媒体等一定的自由，这方面做得很实际。

再次，在经济上，推行解散财阀、进行土地改革的政策。美国认为，财阀是日本发动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新兴的军火大财阀大战争横财。战后，为了斩断日本军国主义的一切经济基础，美国占领当局发出指令，对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财阀和83家控股公司，以及56个财阀家族采取措施，包括解散控股公司，禁止财阀家族的人兼任重要领导，清除经济战犯，凡是不利于日本未来的经济走向和平目标的人员，都要逐出经济领域的重要岗位，将相关公司企业股票分散等。这种改造现在还有很大意义。

这一点开始的时候比较彻底，但

战后初期，美国远东政策的战略目标：彻底根除日本的战争潜能，使之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因此以“拆迁赔偿”的方式，强制日本把指定的工业会社设备转让给曾被日本占领和破坏的国家，如东南亚各国。但随着美国对日索偿政策的变化，原来指定为拆迁对象的工业会社停止拆迁，几乎完整无损保留了日本的工业基础。在台湾的蒋介石政府为获得日本的承认，放弃战争赔款。如果坚持索取原定的6000亿美元的巨额赔款，日本经济决不会有日后那么快速的恢复发展。这样一来，使得日本为侵略战争罪行所付出的代价极少，导致战后日本经济重新对外扩张，一部分顽固派人士拒不承认对邻国的战争加害责任，战争史观右翼化。

第二，停止了对财阀的解散。该政策从1945年11月开始实施，到1951年，日本政府宣布“解散财阀的任务已经基本结束”。但实际上，最初被指定拆散的公司达到500多家，真正得以执行的只有十几家，最后彻底拆散的只有6家。这为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工业现代化，保留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一些日本极端人士对侵略历史缺少悔过之心和认罪态度。

全面被美国的软实力控制，学校机构和主流思想都明显的美国化，十分崇拜美国，反而缺少自己的独立思考。举个例子，现在大量外来语充斥着日本的日常生活，很多七十岁以上的老一代日本人，都听不懂、看不懂。

因此，什么时候日本能真正实现政治、经济的独立，摆脱依附于美国的现实，才能取得更好发展，同时有助于东亚地区实现真正的和平与和谐，而不是按照美国的意志来走。

最近这些年，随着中国国力增强，国际影响也在不断扩大，未来相信前景会更好。而总的来看，美国是在走下坡路，日本的经济也随之停滞，即所谓“失去的二十年”。

目前，中国的GDP（国内生产

总值）大约是日本的2倍，但对此千万不能盲目乐观和迷信，因为中国的GNP（国民生产总值）还是不如日本，从人均来看，差距就更大。

所以，中国人永远不要轻视日本，而应该更好地了解、研究日本，对战后七十年来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有通盘认识，争取做一个“知日派”。这样对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才能做出更有益的贡献。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研究员、博导，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中日关系史研究》主编，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中方委员，已出版《日本帝国的兴亡》等多部专著。本文由陈茜根据作者日前在北京朝阳区图书馆所作演讲内容整理。

第三，放宽和解对二战战犯的审判与整肃。战后初期，美国及盟国方面对日本战犯进行了严厉的清查审判，但伴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整肃的对象发生了变化，从战争狂人转向共产党、工会等左翼团体。在美国主导下，日本官方向各个大学施加压力，要求解雇教职员中的共产党。1950年6月，解除了24位共产党员的公职，严重打击了日本的左翼力量。

而对于战犯，1950年10月至1952年8月，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原来要整肃的20万日本军官和法西斯头目，95%得以“过关”，至1958年，所有在押的日本战犯都得到了赦免。特别是一些日本战犯后来又重回政界，甚至占据要职。如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外公岸信介，本列为甲级战犯，竟出任了日本首相，组成所谓的“战犯内阁”，给日本社会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美国战后对日政策的这一波调整，深刻影响了日后的东亚国际政治格局，也改变了美国在东亚的战略重心及其盟友组成。原来美国是想把中国当做盟友，日本是敌国，后来反而是日本变成了美国在东亚及整个亚太地区最坚实的盟友。

上接《E1

“两轮”甲子

尽管如此，在经济温和发展的这些年里，中国的民族自行车工业还是诞生了。它以零售店和修理厂为发端，如天津仁得利车行仿制自行车零部件，最后发展为将进口及国产的零部件组装成完整的自行车。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至少有六家知名车行在运营，其中一家是同昌车行。同昌车行为英德两国的几家自行车和摩托车生产商作代理，同时也销售车行名下的自行车，如前面提

车来车往见沧桑

1949年前后，西方人在中国拍摄的照片都表明：三轮车最多，自行车次之，人力车极少见。

1937年以后的十八年，中国大部分时间处于战争中，首先是抗日战争（1937~1945年），其后是国共两党间的战争，共产党于1949年获胜，最后是抗美援朝战争（1950~1953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一度得以发展的经济，基本陷于停滞。

抗日战争的影响之一，是中国境内汽油严重短缺，这极大地限制了汽车的使用，一种新型的个人交通工具三轮车应运而生。它既有自行车的速度，又有人力车的载运能力。迄今还不确切知道三轮车的发明人，但在20世纪20年代的亚洲，一些城市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三轮车，数量或多或少。如上海早在1924年就有了三轮车。三轮车在当时被视为机动交通的威胁，1927年上海禁止这种车辆在公共租界和中国管理区内的街道上行驶。抗战爆发后，三轮车作为汽车的非机动替代品再次出现。1945年战争结束时，上海有6000辆三轮车，1949年，增至26570辆。

三轮车从根本上取代了人力车，这得益于1946年1月国民政府颁布的一道命令，它要求在接下来的三年中逐步淘汰人力车。很可能是人力车的剥削、不人道、文化倒退的形象，促发了这一命令。此后人力车的数量锐减。

上海在战前有人力车6万多辆，1947年时有12670辆，1949年时仅有3659辆，许多人力车夫接受重新培训而成为三轮车夫。1956年，上海的最后一个人力车退役，它作为一件历史古董送交上海博物馆。广州的情况与之相似，至1949年3月末，4500辆用于出租的公共人力车有一半以上被淘汰。

1948年8月，美国汉学家卜德(Derk Bodde, 1909~2003年，美国东方学会前主席，主要研究中国法制史)在离开中国11年后再次来华，他注意到，北京“与过去相比，最大变化之一，是老式人力车被新型的、外国人称之为pedicab的三轮车所取代。……随着三轮车在日据时期的引入，现在人力车已废弃不用了”。可以说，人力车的终结，在时间上要早于共产党接管全国政权。

战时机动交通设备的减少和人力车遭淘汰，自行车是受益者。上海的自行车的数量，在1929年至1948年间差不多增长了八倍，从约4万辆增至23万辆。1948~1949年间，《旅行杂志》所刊登的由四家橡胶制造商投放，与自行车车胎有关的广告不断增多，间接证实了自行车的日益普及。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邮递员，每人一车。

到的飞马牌，还有飞人牌。

就像自行车上的标牌所说，飞马牌实际上是“英国考文垂特别为中国上海同昌车行制造”。而飞人牌是由同昌车行自行生产，使用的是车行制造的车架和前轮叉，并将它们与辐条、轴承等进口部件组装在一起。20世纪30年代早期，国内反帝国主义情绪高涨，飞人牌作为“国货”加以宣传。它确实有资格称作中国制造的最后一辆自行车。

20世纪40年代及50年代早期，自行车在中国的某些用途有图片为证。1947年，漫画家丰子恺在上海《申报》上发表了一幅漫画，该画以杭州为背景，画中一名头戴浅顶卷檐软帽的男人骑着自行车，一个怀抱婴儿的妇女侧坐在车后座，还有一个孩子坐在男人身前的横梁上。标题是“全家去看电影”。

漫画家张乐平创作的风靡一时的连载漫画《三毛流浪记》，以上海为背景，于1948~1949年发表。其中一组漫画，展现了一群街边顽童聚集在一家晚报报摊门口，每个人都骑着自行车。他们在等待要分发的报纸，拿到后就迅速冲出并沿街叫卖。

画家朱明纲在这一时期所创作的一幅木刻画，没有明确的地点，画中描绘了五类商贩，最突出的人物是一个戴着锥形农民帽、推着自行车步行的男子，车把上挂着两个大木桶，车后座上捆放着一个木箱。

电影《乌鸦与麻雀》拍摄于1949年共产党获胜前夕，以上一年冬天为背景，片中的主人公之一是中学教师，他的典型标志就是自行车。在一张时间略晚于1949年、拍摄于广州的照片中，七个男青年在街上骑自行车，他们现在被称为邮递员。

这一时期，西方人在中国拍摄的照片都表明三轮车最多，自行车次之，人力车极少见。

如果《旅行杂志》当时所刊登的广告可信，那么中国的城市女性也身处不断壮大的骑车群体之中。两则充气轮胎和一则胜利牌自行车的广告，描绘了悠闲骑车的女性。一则金龙香烟的广告，展现了一个身着旗袍、手夹香烟的苗条女子站在一辆女式自行车旁，并与一位穿着西服的男子交谈。

然而，女人骑车仍然难以让人接受，特别是不被农民接受。当共产党干部于1949年接管杭州时，他们对眼前所见大吃一惊。这些干部来自山东农村，他们不仅认为乘坐人力车是剥削行为，穿西装是资产阶级化，还认为“妇女骑车不像话”。（未完待续）

作者路康乐(Edward J.M. Rhoads)，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系荣休教授，研究领域包括19世纪晚期及20世纪中国的社会史、政治史，以及在美华人史。主要著作有《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走向世界：中国留美幼童(1872-1881)》等。译文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董建中副教授校阅。